

从“从众”到“算法从众”——青少年音乐选择的变迁

苏钰璐 高子茜 王延松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青少年音乐从众的历史变迁, 揭示了算法推荐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选择的内在机制。展望未来, 算法与青少年音乐选择的关系将持续演化, 这一议题在教育、产品和校园文化层面都有很多可落地的实践空间。在学校教育层面, 算法素养培养完全可以融入现有课程, 不需要额外增加过多负担。在音乐产品层面, 可以通过一些小功能设计引导青少年突破算法茧房。在校园文化层面, 很多简单有趣的活动都能帮青少年找回算法之外的音乐乐趣。

关键词: 青少年; 算法从众; 音乐选择; 数字主体性

DOI: 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09040

0 引言

从广播时代的排行榜到MTV时代的热播单曲, 青少年音乐消费始终嵌入在社会网络中, 音乐从众并非新议题。然而随着流媒体平台的崛起, 算法推荐系统成为音乐分发的核心架构, 从众的生成逻辑正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从众由同伴群体与大众媒介共同塑造, 而算法从众则是由推荐技术与社会从众机制相互嵌入、彼此强化后产生的新型趋同效应——它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 而是算法将“群体偏好”包装为“个人专属”, 使“别人听什么”悄然变成“系统觉得你该听什么”。

青少年作为数字原生代, 正处于这一转变的核心地带。一方面, 他们的音乐偏好高度依赖同伴认可与社会归属, 同伴推荐因承载情感认同而被青少年视为“自己的选择”; 另一方面, 他们又深度嵌入算法推荐的信息环境, 接受着平台基于协同过滤、流行度排序和内容匹配所构建的选择引导。两者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本文基于比较传统从众与算法从众的差异, 剖析算法对青少年音乐从众机制的重构过程, 探讨这一转变对音乐多样性及个体审美自主性的影响, 并考察青少年在依赖与抵抗之间的实践策略。

1 青少年音乐从众的社会心理基础

青少年通常指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年龄范围划定为10至19岁。中国发展心理学领域一般将青少年期界定为11、12岁至17、18岁。Erikson则从心理社会角度强调, 青少年阶段的核心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避免角色混乱。青少年是音乐爱好中的重要人群。从众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倾向, 在青少年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理解青少年音乐从众的传统形态, 是把握算法时代从众变迁的前提。下面主要从传统媒介路径方面, 分析

青少年音乐从众的社会心理。

1.1 广播电台时代

广播电台是现代意义上第一种将音乐大规模、常态化地送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媒介技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无线电广播在欧美普及, 音乐从需要亲临现场的表演或私人空间的唱片播放, 转变为经由电波传送的公共信号。Adorno在论及广播音乐时指出, 无线电将音乐从聆听行为转变为背景消费, 音乐的“仪式性”让位于“伴随性”, 听众所获得的不再是完整的美学体验, 而是被标准化和碎片化的文化产品。这一批判准确揭示了广播技术对音乐接受方式的结构性影响。

广播电台对青少年音乐从众机制的塑造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第一条路径是排行榜与热门歌曲节目。电台基于唱片销量和点播数据编制排行榜, 排行榜的功能不仅是反映流行状况, 更是制造流行共识, 青少年在收听排行榜节目的过程中自然形成趋同选择。Lazarsfeld和Kendall在关于广播收听行为的经典研究中发现, 大众媒介具有“地位赋予”功能。第二条路径是DJ。电台DJ不仅是播放者, 更是音乐价值的裁决者和青少年音乐品味的引导者。这种“把关人”角色使青少年音乐从众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Frith在《表演仪式》中指出, DJ推荐与青少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品味共同体”, 音乐选择嵌入在可辨识的人际传播网络中, 从众的动因是社会归属, 从众的过程是缓慢而可见的。这一时期青少年音乐从众机制的总体特征是选择来源单一但可见, 从众指向明确且可反思, 趋同速度缓慢而范围有限。

1.2 电子音乐时代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成熟与影视剧传播载体的崛起, 重塑了青少年音乐选择的媒介生态。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普及大幅降低了音乐生产的门槛。技术赋权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更是音乐

文化空间的重构。

俱乐部文化催生了一种全新的音乐从众机制——场景性从众。Thornton在《俱乐部文化》中分析了电子舞曲文化中DJ与舞池的互动关系：在俱乐部场景中，DJ的选曲不再是单向推荐，而是根据舞池的实时反馈动态调整，音乐选择由此获得了一种即时互动的维度。青少年在俱乐部或派对中的音乐选择不再仅仅跟随大众媒介的排行指引，而是受到场景性同伴影响的驱动。这种场景性从众与广播时代的媒介性从众有着本质区别。青少年通过参与特定的俱乐部场景、追随特定的DJ，完成了从“听什么歌”到“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身份建构。

总的来说，电子音乐时代的从众机制体现出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转变。青少年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介的受众，而是在具体的音乐场景中积极参与意义的生产和传播。

1.3 影视剧时代

1981年MTV开播标志着音乐视频时代的到来，音乐的传播获得了新的视觉通道。Negus（1992）在《制造流行》中指出，音乐视频改变了流行音乐的消费逻辑——观众不仅“听”音乐，还“看”音乐，视觉形象成为音乐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视听结合”的消费模式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音乐选择机制。

对于青少年而言，MTV提供了一种双重从众的路径。一方面，MV的高频轮播使特定歌曲获得持续曝光，推动了媒介性从众的延续；另一方面，MV中呈现的生活方式、时尚风格和身体形象为青少年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参照。电影原声带是这一时期另一条重要的音乐选择路径。从《周末夜狂热》对迪斯科文化的全球性推动，到《泰坦尼克号》使《My Heart Will Go On》传遍全球，影视剧音乐使青少年在不以主动搜索为前提的情况下接触到新音乐。影视剧插曲使音乐获得了叙事性语境，听众对音乐的情感反应不再纯粹基于声音本身，还叠加了对影视叙事的情感投射。这种叙事性中介使音乐选择具有了情感驱动的特征。

因此，这一时期青少年音乐从众机制是从众不再是“跟随排行榜”的单一路径，而是在媒介传播、场景互动和叙事情感之间形成多重参照。

总体而言，青少年音乐从众经历了广播、电子音乐和影视剧三个时代，每个时代的技术环境都塑造了不同的音乐选择方式。从跟着排行榜听，到在俱乐部里跟着氛围跳，再到因为影视剧剧情爱上一首歌，从众的路径越来越多元。

2 算法时代青少年音乐选择的变迁

从众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其研究可追溯至阿施的经典线段判断实验。在传统音乐文化语境中，从众行为伴随着清晰的社会感知和意义建构。然而，随着流媒体音乐平台的普及和算法推荐技术的深度渗透，青少年的音乐从众行为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转型。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得算法推荐从可选项变为默认项，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从童年阶段便深度嵌入算法推荐的信息环境中。本章从算法技术的运行逻辑切入，分析算法在认知、选择、意义三个层面对青少年从众心理的重塑，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数字主体性重建的可能路径。

2.1 从自觉从众到无意识趋同

传统从众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自觉性。Solomon Eliot Asch的经典实验表明，个体在做出从众判断时，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群体的不同意见——无论是为了避免排斥而表面附和，还是因为真心地相信群体判断而内化接受，从众行为都发生在意识可及的层面。在传统音乐文化中，青少年选择与同伴相同的音乐，往往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策略。算法从众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特征，从众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主体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从众。这种无意识趋同的生成，根植于算法推荐的黑箱特性。智能推荐算法声称客观中立，实则嵌入着平台的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推荐结果服务于平台的商业目标而非用户的真实需求。当一首歌曲反复出现在推荐页面的前列，当整个歌单都呈现出相似的风格和情绪，青少年可能认为自己是自主选择，而实际上选择空间早已被算法预先框定。

2.2 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上述无意识趋同现象与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网络丧文化的研究表明，当代青少年普遍面临情绪表达的困境，倾向于在数字空间中寻找情感共鸣。算法推荐恰恰利用了这种心理需求。从自觉从众到无意识趋同的转变，标志着从众的心理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意义空洞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音乐选择与自我认同之间联系的松散化。传统音乐社会学研究表明，音乐品味是自我身份的重要表达——你听什么音乐，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而在算法时代，音乐选择越来越多地由算法决定而非个人主动探索，音乐品位的身份表达功能随之弱化。张雪关于网易云音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视角：平台的社区至上逻辑通过社交推荐和情感推荐为用户提供了突破流行度偏差的通道，同伴网络中的独特推荐能够进入算法推荐

池,从而在平台框架内保留了文化多样性的可能。肖剑关于歌单策展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通过创建和分享歌单进行品味表演,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音乐选择——这种表演既是对算法推荐的协商,也是对社交圈子的品味声明。这些研究说明,即使在算法主导的时代,青少年仍然在努力为音乐选择注入社会意义,抵抗意义空洞化的趋势。

2.3 青少年音乐选择的数字主体性重建

算法从众对青少年主体性的三重消解,并不意味着青少年只能被动接受。事实上,青少年在与算法的互动中已经发展出丰富的抵抗策略。而青少年数字主体性的重建需要个体、社交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协同努力。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梳理青少年音乐从众的历史变迁,揭示了算法推荐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选择的内在机制。从广播时代到电子音乐时代再到影视剧时代,传统从众始终有清晰可见的社会中介。进入算法时代后,这一机制发生了三重深刻转变。在认知层面,算法将群体偏好包装为“为你专属”的个性化推荐,使从众从自觉行为变为无意识趋同,青少年可能在浑然不觉中被限制在信息茧房里。在选择层面,协同过滤算法造成的路径依赖取代了主动探索,音乐发现从充满惊喜的偶遇变成可预测的闭环。在意义层面,算法推荐抽空了音乐的社会认同价值,使从众行为失去了原有的社交连接和身份建构功能,音乐选择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也越来越“空洞化”。

展望未来,算法与青少年音乐选择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王廷松.音乐心理学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 [2] 周茂君,罗丹.算法驯化与用户抵抗:智能推荐系统中的动态博弈[J].当代传播,2025,(4):18-23.
- [3] 宋克歌,汪邓涵,黄燕君.考虑流行度和从众性的因果去偏音乐个性化推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6,41(1):78-88.DOI:10.13582/j.cnki.1672-9102.2026.01.009.
- [4]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 [5]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W. W. Norton.

作者简介: 苏钰璐(2000.08—),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艺术教育、音乐教育、音乐学理论等研究方向。

高子茜(2003.01—),女,汉族,陕西延安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艺术教育、音乐教育、音乐学理论等研究方向。

王廷松(1970.01—),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学生发展与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音乐心理学、艺术教育等。

项目信息: 陕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红色音乐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YD2025009)。

将持续演化,这一议题在教育、产品和校园文化层面都有很多可落地的实践空间。

在学校教育层面,算法素养培养完全可以融入现有课程,不需要额外增加太多负担。比如在班级里可以搞“每周一歌”轮值推荐,每个同学轮流推荐一首自己喜欢的非热门歌曲,利用早读前五分钟播放,听完后大家可以自由交流感受。这种小规模课堂活动既能培养学生对算法的感知力,又能实实在在地帮他们拓宽音乐视野。

在音乐产品层面,可以通过一些小功能设计引导青少年突破算法茧房。比如音乐APP的青少年模式里加一个“音乐盲盒”按钮,点一下就随机播放一首完全不在用户偏好标签里的歌曲,听完可以选择“收藏”或“不感兴趣”,在可控范围内拓展音乐边界。又如校园音乐小程序可以做“班级共享歌单”功能,每个同学每周可以推荐一首歌加入歌单,歌单按推荐时间排序而非热度排序,同学们在听的过程中还可以给歌曲写小评论,让音乐发现重新回到人际互动的语境里。这些功能实现成本不高,但能有效平衡算法推荐的单一性。

在校园文化层面,很多简单有趣的活动都能帮青少年找回算法之外的音乐乐趣。比如高中音乐社团可以办“歌单交换市集”,大家把自己的私藏歌单打印成小卡片互相交换。比如班级文艺晚会上玩“猜冷门歌”游戏,用游戏化的方式鼓励大家主动探索多元音乐。这些活动不需要复杂的组织,却能让青少年在算法之外,重新通过真实的人际互动发现音乐的丰富魅力。